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主題意識探析

著者／陳建華

現為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碩一生

「眷村」，一般人腦海中所映現的，是怎麼樣的一幅景象呢？生於長於眷村的第二代，自幼在父執輩描述虛幻的家鄉與反共大業的思想灌輸，她們對身分的認同以及根之所在，產生了模糊且不確定的定位所在。因此，她們以身歷其境的經驗與能量，同時承載了父執輩國仇家恨的家園，用筆將其記錄並留存下來，再加上離開眷村在不同環境生活下，藉著書寫來表達自身的矛盾，甚至急欲卸下被稱作外省人的包袱。朱天心的作品研究多半是以時間脈絡為主軸，依其少年、青年、中年的階段一貫討論下來，書寫其中〈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眷村生活的記憶，情節不斷以隱喻的方式，來表達眷村第二代身分認同的辯證。現在眷村三代陸續的成家立業，如果身分認同依然虛無飄渺，對於文化傳承的正當性是否有所依循？隨著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陳述及其他出身於眷村作家的記憶，按圖索驥的認識眷村，經由引證確立眷村人的身分認同，並尋回即將凋零的眷村文化。

壹、前言

民國 1948 年 9 月揭開了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序幕，繼遼瀋、淮海與平津會戰三次戰役後，中國共產黨以勝利者的姿態統治了整個中國大陸。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中國一分為二；不甘為共產黨統治的軍、公、教，與一般百姓隨著國民政府轉進到了臺灣，就這樣一場拋妻棄子、離鄉背井的歷史的悲劇，如同洪水般淹沒了全中國人的心。據文獻記載，蔣介石在內戰開始失利之時，即開始著手計畫撤守臺灣之戰略布局；就在此時，耶和華是否也同樣給了蔣介石建構方舟的指示呢？但，當時的臺灣並不是諾亞方舟¹，她卻是一個能提供了方舟準備停靠安全無慮的母港。

回顧眷村的發展，緣起於 1949 年國民政府因為戰事失利，而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各省軍民及其眷屬倉促間隨政府跨海撤遷來臺，為了安置這些出生入死的軍人及其死生與共的眷屬，於是政府就在營區周圍因陋就簡地搭建了許多臨時的棲身之所，這就是後來所俗稱的「眷村」。

眷村文學的起源追溯於 1960 年代開始，書寫內容大致歸類為五種情懷（一）懷著對家國命運的憂患悲愴，從期盼反攻還鄉，父執輩的戰爭記憶與鄉愁想像，眷村生活的眷戀，寫到終究自甘老死於臺灣。（二）從瑣記眷村兒女的愛戀心事，鄰里是非，到辯證家國歷史，反思記憶想像，甚至操演情欲政治；凡此種種，交織出半世紀的社會變遷與家國滄桑。（三）從懷著對家國命運的憂患悲愴，而書寫失去祖國、落居異鄉的反共懷鄉小說。（四）主要出之於外省第二代，描寫被時代、被故鄉遺棄的「榮民」老兵小說，與分隔海峽兩岸數十年而後骨肉重逢的探親小說。（五）近代則因眷村改建的觸感，表述出另一種情感思維與形式，再度發展出辭鄉的眷村小說。²

就臺灣文學史而言，上述眷村書寫與強調臺灣主體性的本土文學，形成臺灣複雜人文生態的重要部份，因生活與文化之間的參差對照，觸動了兩者之間所存在的種種糾葛緊張與重疊模糊地帶，許多出身眷村的小說家也都有深入的刻劃。³ 儘管眷村小說有其本身發展上的侷限性，但是從眷村小說所衍生出的幾個文學面向與議題，如成長啟蒙、國家想像、族群自覺、時空意識、性別議題與政治訴求等等，他們書寫的方式含著父執輩複雜的鄉愁與孕育出他們的族群融合出生地，卻對眷村小說家之後的文學創作起著或深或淺的影響，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可謂是積極而開放的。

以「眷村」為書寫主題或重要場景的文學作品，經統計與分類目前其表現形式有廣及詩歌、散文、小說與戲劇等等，以下略述之：

（一）詩歌方面：如苦苓在《外省故鄉》⁴ 1993年9月一書中所收錄的〈新生代〉、〈眷村〉、〈召集令〉等作品。

（二）散文方面：如夷青所編撰的《我從眷村來》⁵ 臺北：希代出版社 1986年2月等合集，與為數眾多的散見文章。

（三）小說方面：占大多數，如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⁶，其他還有朱天文《小畢的故事》⁷、袁瓊瓊《今生緣》⁸、苦苓、孫瑋芒《卡門在臺灣》⁹、張大春《四喜憂國》¹⁰、張啟疆《消失的口口》¹¹、張國立《小五的時代》¹²、愛亞《曾經》¹³、蘇偉貞《離開同方》¹⁴、蕭颯《如夢令》¹⁵等作家都有相關著作。

（四）戲劇方面：1983年由陳坤厚執導的臺灣電影，與朱天文同名作品〈小畢的故事〉；以及1997年公演，由「臺北故事別場」推出的舞臺劇〈花季末了〉等，都可為代表。

眷村文學作品中以「小說」占大多數，主要是由於小說因它的文類特質適足以表陳多層面的人事滄桑，使其較諸其他文學類型，更能流露出小說家豐富的創作意識與思維過程，是一可以表現多重面貌與廣度的文類。論者即曾指出，作家發揮的想像力能

夠超越時空的限制，召喚出不同世界圖像。林秀姿這麼說：

作家文本仍受社會環境與空間經驗所影響外，相對的作家亦透過文本來召喚想像的鄉土，召喚著不受父權左右的世界。作家利用文本的想像與召喚，其實是指出了文本不僅反映現實，更有作家意識或無意識的召喚與想像的城市與空間經驗。¹⁶

而也正因為小說的可變性，讓其成為幾位小說家在書寫其童年記憶、其心境因時空遷移而改變時，最常援用的一種，進而共同累積出一定的創作數量。在眷村的狹隘生存空間與侷限格局裏，小說作品中往往呈現一種自我思辨的過程，也不時與外在現實世界形成相互對話、彼此詮釋的空間，這樣的特性，正是以用來呼應與小說家自覺意識，與臺灣時代環境皆息息相關的眷村文學。

就眷村小說的發展軌跡言，在相當程度上反應了臺灣幾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變革，並進而提供了另一種閱讀歷史的文本資料。此外，儘管眷村小說有其本身發展上的侷限性，但是從眷村小說所衍生出的幾個文學面向與議題，如成長啟蒙、國家想像、族群自覺、時空意識、身分認同與政治訴求等等，卻對眷村小說家之後的文學創作起著或深或淺的影響，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可謂是積極而開放的。

眷村書寫的積極意義，與其定位在承續、再現父執輩的戰爭記憶與鄉愁想像，塑形自我特定之族群文化，但內心的流離與游移卻勾勒在「原鄉」與「現實」之間的不對稱性，對外界與自我產生更深刻的複雜反思，並見證環境時代變遷與與時光交錯國家滄桑的無奈。

綜觀幾位重要的眷村小說家，如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孫瑋芒、張大春、張啟疆、張國立、愛亞、蘇偉貞與蕭颯等人，因眷村文學都成為影響臺灣文學生態甚深的重要小說家，甚至帶動了一些不同層面與風格主題的創作潮流，眷村文學視野深廣兼以美

學形式上諸多突破與創新，自使其對臺灣文學／文化主體之建構，多所貢獻。

這些眷村小說家在面對這個時代的諸多課題與考驗，她與同世代知識分子針對時局的詭譎，而引發出身分認同的辯證所產生出的對話與因應，究竟呈顯了什麼樣的時代課題，而這與往昔歷史上的知識分子精神又有著什麼樣的承襲與演化？他們又是如何引導我們去思考這個時代？本論文試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為研究文本略作探討。

文學創作文字藝術的表達，利用文字除了緬懷過去，更要有生命的表達未來的憧憬，隨著眷村改建的落幕，是否意味著眷村文化逐漸凋零乃至消失，只憑藉書寫又能保留些什麼呢？曾洋洋灑灑揮筆記錄著成長過程的眷村第二代作家們，可想過將來在歷史上是否尋得到眷村的蹤影？

貳、朱天心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眷村影響臺灣社會

朱天心（1958-），祖籍中國山東臨朐，出生於高雄縣鳳山市，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長於文學家庭，父親朱西甯和姊姊朱天文同為臺灣重要作家，母親劉慕沙為翻譯家。中學時代已初露文學天分，1977年與藝文朋友創辦《三三集刊》（1977-1981），孺慕中華文化，師承胡蘭成，並視張愛玲為文學導師，並擔任主編。大學畢業後即專事寫作，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獎項。

朱氏作品一開始大多從貼己的周圍生活出發。三三時期，以校園、家庭、眷村生活營建青春烏托邦，小說《未了》（1973）、《昨日當我年輕時》（1981）和散文《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1977）、《方舟上的日子》（1977），筆觸浪漫清麗，慷慨軒昂。解嚴之後，身分認同遭逢文化政治衝撞而轉折，閨秀文風漸褪，《臺大學生關琳的日記》（1984，小說後更名為《時移事往》）的惶惑不安作為風格的轉捩徵象；當烏托邦萎謝，其書寫對象也發生了變化，小說集《我記得》（1989）、評論集《小說家的政治週記》（1994）以犀利尖銳的力度描寫與批判社會現實。散文集《學飛的盟盟》

（1994）卻又彰顯為人母的溫軟柔情。縱然如此，幾經現實的失落，履歷的淬鍊，《想我的眷村兄弟們》（1992）、《古都》（1997）透過記憶、歷史、空間，描述外省第二代的過往滄桑、批判都市進步帶來的傷害，允為朱天心創作生涯高峰。之後，《漫遊者》（2000）表達失去父親後的沉慟；《獵人們》（2005）側寫群貓，流露對於動物與生態的關注；《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2010）則寫出中年哀樂，歎惋青春與中年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朱天心以個人的身歷其境，積極地回應社會和自我，關懷外省族群和弱勢，選擇中性基調突破女性作家框架下創作，在題名已經清楚昭示這是談眷村的小說，出版後也的確成為眷村文學典範。

在朱天心諸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中，〈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是以回憶方式來闡述眷村第二代對故居的情愫，將文字活化並生動的重現他們身邊的一景一物；在小說中的主角以「她」第三人稱來貫穿成長歲月，若以讀者角度觀察這個「她」似乎正是朱天心本人。但在峰迴路轉的小說情節中，又像是個集合名詞，指著當時在眷村長大的女孩們，從天真無邪到青澀懵懂，從涉世未深到自我疑惑，一個個在面臨升學與就業、婚姻必要階段下，必須離開眷村去因面對文化差異而產生身分認同窘境。小說中敘述道：

於是，妳會在離家唸大學或開始就業時，很自然的被那些比起妳的眷村愛人顯得土土的、保守沉默的本省男孩所吸引，儘管他們之中也多有家境比眷村生活還要窘困，或比眷村男孩的動輒放眼的中國、放眼世界的四海之志要顯得胸無大志得多，但他們的安穩怡然以及諸多出乎你意料的對事情的看法，都使得妳窒悶的生活得以開了一扇窗，透了口氣。儘管多年後你細細回想，當初所感到的窒息也許並非全然因為眷村生活的緣故。¹⁷

半封閉眷村的小小領域裏，在軍事化管理及父輩保守觀念的影響下，往往不會有太多的異想世界；當眷村第二代極欲跳脫這一框架的剎那，五味雜陳的猶豫就像掙脫環

環相扣的枷鎖，面對真實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內心的糾葛會在對錯之間產生出摸不著邊的迷失。在民國五、六十年代，國語的推行則是強迫性的政策，本省籍這一代的兒童，靠著家產的優勢今日多已事業有成；以現在求職面試的普遍現象，多數均已要求會說流利的閩南話，而成為任用的首要條件；這樣的要求，在反思的心理層面下，是否意味著因為當年被強迫說國語，內心積壓的怨恨而造成的反撲現象；這樣的因果，也的確讓眷村的第二代及其子女，增添了無奈之感，無形中也成為求職族群中的弱勢之軀。

解嚴後，使得統獨爭議擴大，國家認同的分歧因而遭受到極大挑戰，造成內部嚴重對立，對臺灣民主的健全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當時的朱天心在眷村成長的背景下，成為被隔離及唾棄的對象，其處境之艱難正如陳培文以下所描述：

二十歲之後，當這一世代知識青年多數倒向反對運動，視國民黨為寇仇時，她卻不惜被扣上「保守」、「國民黨同路人」的帽子而遲遲吾行，只為了真正搞清楚：民主的紮根，並不在於一時情緒化的反蔣、反國民黨，而在於將民主的思維理念、組織運作教育大眾。可惜臺灣的民主發展至今仍多流於情緒性的意識型態之爭，在以國民黨、民進黨為首的兩大陣營「只知道黨、不知有國」的敵我鬥爭中，有學理為根據的理性忠言遂成為最不討喜的雜音，也因此，解嚴後政治思維成熟、大量書寫政治意見的朱天心，這一路行來的十多年，雖說總會逢遇知己，但畢竟謗議隨之。¹⁸

以上引文敘及臺灣民主的進程，自黨外人士所發起的美麗島運動與抗爭後，國民黨內部在前總統蔣經國先生的決定下，做出了如開放黨禁、報禁的重要決策；無疑的，「美麗島事件」是中華民國政治史的一個民主高峰，也是生活在臺灣所有人民的思想蛻變，更促使關心這塊土地的人，重新反省思索彼此關係的調整、重新為歷史尋求新的定位。在這政治變革與新舊理念的衝突下，眷村的第二代除了軍人出身，對於當局的施政與

之前被壓抑的思緒，先後以不同的方式表露出對執政者質疑的態度，更表露出眷村第二代呼之欲出「我到底是誰」自我認定的疑惑。朱天心就是生長在當下，從以下的字裏行間中已充分呈現出對解脫之前的枷鎖充滿著期待與盼望。

與其說妳們是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如妳丈夫常用來嘲笑妳的話），妳更會覺得其實妳和這個黨的關係仿佛一對早該離婚的怨偶，妳往往恨起它來遠勝過妳的丈夫對它的，因為其中還多了被辜負、被背棄之感，儘管終其一生妳並未入黨，但妳一聽到別人毫無負擔、淋漓痛快的抨擊它時，妳總克制不了的認真挑出對方言詞間的一些破綻為它辯護，同時打起心底好羨慕他們可以好羨慕她們可以如此沒有包袱的罵個過癮。¹⁹

壓抑，是一種情緒的反應，思想教育在當時的眷村是不可缺的，在一黨獨大的禁錮下，對於眷村人來說似乎再也平常不過了，且更是理所當然；而面對「現實」的透視，臺灣社會政經變革的隱憂突顯而出，為什麼政治不見理想，反充斥著權力慾望競逐？為什麼經濟發展不見長遠規劃，卻盡是短視近利的土地炒作與金錢遊戲？藉由對家、國、鄉土、城市的一再辯證想像、對聖戰神話崩解後諸般衍生變形的演義，他們在敘述中銘記時光推移，也在時光推移中不斷敘述；在不同於一般的深廣視野，於是就在這「在」與「不在」的反覆辯證之中被展開來。

「眷村」等於「既得利益者」等於「國民黨同路人」的污名化邏輯論述，同時，〈想〉文也呈現出博聞強記的朱天心「通今昔之變」的功力，其於文學史上的位置明顯的確立。之後，民進黨執政，本土政客們直指外省族群不懂臺灣、不愛臺灣，視之為外來政權之際，臺灣在政黨輪替、歷史記憶大量流失之際，民心徬徨不安之際，因此獲得甚大迴響。從書寫記憶角度來說，朱天心作為一個創作者，她的生命確實鑲嵌在整個時代脈絡之中，時代養成她更影響她，她一路的生命軌跡、創作書寫也映襯了時代的特殊面貌與課題。

參、眷村的成長回憶／記憶是世代交替的省思

眷村是臺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聚落，也是歷史造就的一段特殊際遇，更是一種命運捉弄的「緣分」；這些國難時期因陋就簡蓋建的眷村，容納了大陸各省來臺的軍人與其眷屬，言語上南腔北調，生活習慣各異，穿衣吃飯也大不相同，卻因隸屬同一軍種或單位而一同被安置竹籬笆圍籬之內，形成了特殊的眷村文化。它孕育出傳承故鄉文化的第二代眷村子弟，在克難環境的成長過程中，一戶戶用簡單的建材與單一的設計所蓋的連棟矮房，左右鄰舍因此而培養出唇齒相依的革命情感；如今，都市計畫下的眷村已成過往。黃錦樹〈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臺灣一從朱天心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一文曾言：

「眷村」的邊界逐漸溶蝕，「眷村的兄弟們」散佈於都市的各個角落。在現實裏的「眷村」消失後，他們化身為隱形的族類，他們的下一代業已不再是「眷村子弟」，而是島嶼的居民。所以她（對自己）說：「總而言之，你們這個族群正日益稀少中，妳必須承認，並做調適。」族群人口的日益減少，就暗示了記憶傳承的中斷危機，暗示了這一段歷史被「擦拭」以至消失的可能。²⁰

終究，眷村第二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多已非所謂純種的「外省人」，又他們不僅對所謂的原鄉沒有那麼濃厚的感受和連結，相反的，他們反而有著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原始情感和「認同壓力」，也因為這種「原生」的情感和壓力，所以眷村第二代的人也各自摸索出了應變之道：如朱天心就認為眷村第二代的孩子們，除了會唸書的離開村子外求出學之外，男生混幫派、女生嫁老外，就是一種離開村子，走出眷村陰影、踏入臺灣社會的一種方式，但是在眷村改建政策的推行下，這些眷村第二代的孩子們，卻深刻的感受離散的不捨。

眷村就像一個小中國，為了印證這樣的比擬及尋根之所在，以眷村為題材的書寫作家，在族群糾葛衝突的年代，雖然離開眷村各自為生存而奮鬥之際，總是不經意地提到各家的飲食習慣，雖增加了點趣味性，但卻凸顯出的一代眷村人對家鄉思念的情懷，朱天心就以不同的飲食習慣來來詮釋眷村裏來自各家鄉的組合，她寫到：

江西人的阿丁的嗝味其實要比四川人的培培要辛辣的多，浙江人的汪家小孩總是臭哄哄的糟白魚、蒸臭豆腐味，廣東人的雅雅和哥哥總是粥的酸酵味，很奇怪他們都絕口不說「稀飯」而說粥，愛吃的「廣柑」就是柳丁。更不要說張家莫家小孩山東人的臭蒜臭大蔥和各種臭蘸醬的味道，孫家的北平媽媽會做各種麵食點心，他們家小孩在外遊蕩總人手一種吃食，那個麵香真引人發狂……。²¹

在這部小說裏，朱天心刻意以吃得太飽，而發自肺腑打的嗝兒味，來詮釋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飲食文化。眷村裏，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婆婆媽媽，過年前仍依循家鄉習俗，灌香腸醃製臘肉、豬頭皮及豬肝；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拉出一或兩根長竹竿，搭上曬衣架或院子裏果樹的橫向樹枝，利用南部冬天乾燥的東北季風及溫暖的陽光，整整齊齊的曝曬起香腸、臘肉等；傳來一陣陣五香料所散發出的香味，正引誘著村裏垂涎欲滴的青少年。

小說中並沒有特別提到眷村的童趣，回憶在過年前一起成長的弟兄們就會準備著剪刀，瞄準本省籍媽媽所灌的香腸，就這樣一節一節的剪下去，大夥兒帶著戰利品到空地上，利用磚頭及大石塊圍成小灶烤香腸來吃；或許有人問，為何要專挑本省籍媽媽們所灌的香腸？原因在於其口味微甜不像外省籍媽媽們所灌出又辣又鹹的臘腸，因為要烤來當零嘴以滿足自己的口慾；內文帶入本省籍媽媽的角色，也就刻意蘊涵著族群融合的當然性，大部分的眷村第二代幾乎是俗話所說芋頭與番薯的結晶。其次如玩伴們，常從土堆中尋覓大大小小的土塊，同心協力就地築起一撮撮的土窯，之前在眷村

的兄弟們相互掩護下從農家的田園裏挖掘蕃薯，就為了準備要大快朵頤的焢來吃。再來是不約而同的週期性變更圓紙牌、橡皮圈及玻璃彈珠的童玩流行潮；玩伴在一起互別苗頭、一爭高下，抽牌真功夫、老虎洞過五關，還有橡皮圈疊疊樂；你來我往在相互切磋地當時，兄弟之間的情誼就自然的產生了。

當時倉促撤退臺灣的國民黨百萬大軍及其眷屬，縱然是家世顯赫或是出身富家，在逃難保存實力的轉進下，自然就無法顧及經濟的現實面，所能攜帶的僅是隨身細軟罷了；臺灣在四、五十年代，政治、經濟亦在風雨中搖擺，雖有美國的援助，但也僅用建軍備戰，對民生的改善並無多大助益，貧窮的壓力在拮据的軍人薪水上，生活更是艱苦，當眷村第二代到了就學年齡之時，更是捉襟見肘，所以眷村的媽媽們個個是窮則變、變則通，朱天心就特別提到眷村的媽媽們當時的處境：

媽媽們大概跟彼時的島上普遍貧窮的其他媽媽們一樣忙於生計，成天絞盡腦汁在想如何以微薄的薪水餵飽一大家子。若是從大陸來的媽媽，會在差不多來臺灣的第十年，變賣進最後一樣金飾，在那一年的農曆新年一橫心，把箱底旗袍或襖子拿出來改給眾小孩當新衣，……。²²

在眷村第二代的童年，他們身上的衣物及腳上的鞋，只要還完整通常都是承先啟後，兄弟與姊妹接續著穿，當然也少不了印有中美合作字樣的麵粉袋所縫製成的內衣褲；來自大陸的眷村媽媽們，也不乏因是高官夫人或自身系出名門，她們的壓箱寶不外乎華麗的衣著與手飾黃金等，但移居臺灣眷村後，因物資缺乏與薪資的不足，僅能糊口溫飽一家子人，又隨著第二代的出生，生活壓力也就接踵而來，故唯一能解困的分式就如同小說所述，只有拿出壓箱寶以紓解家境之困。

在大眾媒體與傳播資訊不發達的那個時代，單純又封閉的眷村，媽媽每天忙於生計，家庭代工已成為家家戶戶彌補家庭開銷不足的賺錢方式，除了菜市場買菜張羅三餐外，都待在家裏拼經濟，所以收音機與電視機的節目亦陪伴著她們，順利完成每天的進度，

並能如期交貨及早換取工資。朱天心這麼記錄眷村媽媽的平常生活：

媽媽們通常除了去菜市場是不出門的，收音機的時代就在家裏聽《九三俱樂部》和《小說選播》，電視時代就看《群星會》和《溫暖人間》，要到誰怕誰的時代才較多人以麻將為戲，……。²³

菜市場是婆婆媽媽們每天上午打卡之地，除了買菜也是相互聯誼、打探鄰居動態之處；但中午過後整個市場就一片沉寂，只留下一個個空蕩的平臺；每當晚餐過後，這些平臺就成為論壇之處了，就是眷村兄弟們聚會之處。情緒抒發與高談闊論，在這一片片吵雜的聊天聲，也就這樣度過了青春年少。因為那個時代的媽媽們大都屬於保守的女性，當然是日常生活只是一層不變，唯一的娛樂來自收音機或就近找有電視的鄰居家串門子；打麻將盛行於家庭主婦，是因為丈夫派駐地或軍種特殊不常回家之故，空軍飛官的太太們更以此當社交及走後門的捷徑，也或許是擔心在天空翱翔的丈夫的安危而成為壓力紓解得一種方式吧；但打麻將並不只是打發時間的桌遊，也常被異想天開的媽媽們當做賺買菜錢的工具，故在眷村裏經常有以身抵債或拿糧票同眷補證抵押之情事發生。

只要在眷村長大的男孩，似乎多多少少都有單挑、打群架的經驗，但出發點並非如現在逞強鬥狠，而是出於團結抵抗或先聲奪人的心態，壯大自己的群體而不被眷村外或不同眷村的男孩所挑釁，有關當時雙方人馬對峙的情形，蘇偉貞在《有緣千里》一書就這樣地提到：

……孩子裏為首的是華敏，高方殿後，手中拿的不是石頭就是木棍，跑進村子後就不在前移，後面緊跟上另一群孩子，一看就知道是鎮上的漁民子弟，竄起一陣沙塵，兩隊人馬隔眷村們柱子對峙而望，眼光是武器的話早就把人打死了，突然村外砸進一塊石頭，砸向高方頭右邊，高方機靈地偏了一下躲過了。雙方立刻「外省豬。」「台客。」揚起對罵。²⁴

年齡的成長，童年已逝而玩伴們進入了青澀的發育成長期，在血氣方剛下，單挑、打群架似乎是當時成長的必要過程，不打不相識下，卻牽引著血濃於水的友誼；然屬於乖乖牌用功讀書的兄弟，也會三兩成群不時的出現在菜市場高談闊論。

在眷村成長的青少年，她們的初戀對象往往就是左右鄰居；初吻，對她們來說是一種生澀而甜蜜的承諾，在愛情賀爾蒙的分泌下，總會藉去同學家讀書的理由，與心儀之人獨處與談心，如此不成熟的戀愛，在朱天心的回憶裏就有以下這麼一段的情節：

記不記得妳在成長到足以想到未來的那個年紀，儘管你還在正和村中某個男孩戀愛，那些個乘個涼或看《晶晶》連續劇，父母因此無暇顧及的夏日夜晚，滿山的情侶，……，你們在喧天的蟬聲裏一面發高燒似的熱探索彼此年輕的身體，一面在心裏暗暗告別，自然大多的告別式因為沒考上學校的男孩就要去服役或唸軍校了，但更多的時候，是女孩們片面好忍心的決定。²⁵

以上引文述說著正值青春發育期的眷村第二代年輕男女，對性好奇與身體探索的寫實，在那保守的年代，年輕眷村第二代的性知識啟蒙，不外乎藉助色情小說，宛如小說內提到「她正趴在地上找髮夾時，隨手拾起床下一本沒有封皮的舊書……那是一本粗俗挑逗的筆調寫的性知識書……」。²⁶ 所以，有少部分同村的少男少女，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往往就會相約在隱密之處相互探索對方的身體。進軍校，是典型眷村第二代主要的升學途徑，主要因素不外乎是受父親的影響且自己成績不佳，不然就是家庭經濟而左右了這一代的前途；高中畢業之後，兄弟們各奔前程，就在男生即將進軍校或離鄉升學之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就會依依不捨相互慰藉。雖然軍校所熏陶的習性與民間學校的教育宗旨不同，數年之後仍然依舊惦記住一起成長的兄弟們。

回憶，是人類心靈的依循，過往生活的點滴隱含這經驗的傳承，傳宗接代是生物的本能，站在生物最高等的人類，含有更重要的神聖使命，那就是生命價值的進化，世

代交替即為進化的必然過程，換言之，記憶的存在則有助於傳承的完整性。

肆、身分認同的辯證／國族代表國家存在

在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眷村子弟心目中，眷村生活的記憶、眷村住民患難與共的情感，永遠難以言盡；建國、建華、建中等背負著時代包袱的名字傾巢而出，從未見過祖父、母，到底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對於眷村第二代家鄉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迷思。處於認同危機之中的當事者往往有一種「驅使萬物如軍隊」的激烈，迨塵埃落定之後，反倒才能懷著釋然，冷靜持平看待一切價值；畢竟世間萬物總有一定的位置，種種皆出自每個個人的選擇，朱天心逐漸始能用旁觀記錄的角度去側寫這個社會的整個發展，去釐清個體的存在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同時也去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選擇。在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折〉中曾言：

記憶是身份／認同的另一要件，我們與他人的關係隨時間的消逝而積淀在記憶之中，私人的記憶構成回憶錄或自傳，集體的記憶則為歷史。我們的記憶之中總是包含家庭、社區、大小傳統等等的變化，只有經由召喚過去我們才能解釋現在。²⁷

回顧以前身分證上的籍貫欄位裏，總是烙印著父親的來處；那個陌生且遙遠的地方，在記憶中對家鄉的了解，只是藉著父親的口耳相傳罷了。眷村的第二代，自離開其成長之處而直接面對所謂的本省人，卻是表現出陌生且在生活習性上南轅北轍；可是在同一土地上出生、成長，不知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此乃出自於唐代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紮實的印記在返鄉探親的老兵身上，真是再也恰當不過了，縱然奉獻少壯歲月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老兵，他們的無奈被朱天心很貼

切的形容著：

父親們不禁老實承認其實也好羨慕妳們，他多想哪一天也能夠跟妳一樣，……，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來自己是臺胞、臺灣人，而回到活了四十年的島上，又動輒被指為「你們外省人」，……，自己正如那隻徘徊於鳥類與獸類之間，無可歸屬的蝙蝠。²⁸

「離散」，無疑地是眷村人的宿命，眷村第一代的人因為戰爭而被迫離鄉背井，本來以為只是暫時的「退守」，但沒想到這個「暫時的撤退」卻變成了和親人隔絕、和故鄉分離的長久離別；而眷村第二代的人，則因為眷村的拆遷，而被迫再度搬離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因之，離散乃成為眷村人躲不開的夢魘，也成為注定在他們生活經驗中必須要面對的一段人生插曲。離散，甚至讓第一代的眷村人感覺自己變得無家可歸，再加上政治和經貿環境的轉變，更讓他們變成了沒有歸屬感的「異類」；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來自己是台胞、是眷村人，尤其是「外省第一代」是經過戰亂離鄉背井的「難民」，尤其在國共內戰之後其定位更被劃清界線。在各方論述下，亦有人將這批落難人稱之為「遺民」或「移民」，根據各觀點的定位對於這樣的稱呼似乎所有偏頗，其理由如後王德威在〈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論述：

「移民」、「夷民」、「遺民」形成我所謂的華語語系的「三民主義」。顧名思義，移民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天地；殖民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權力；遺民則逆天命，棄新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黍離之思。但三者互為定義的例子，所在多有。華人投身海外，基本上身份是離境的、漂泊的「移民」。而年深日久，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區的文化，真就成為外國人，就是我所謂的「夷民」。但還

是有一種海外華語發聲姿態，那就是拒絕融入移居的文化裏，不論如何，仍然堅持「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想像，形成所謂的「遺民」。²⁹

1949 年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因內戰而遠從大陸各省渡海迫遷來台安身立命，其身分在當時的定位是為難民，但在現實的政治操作下，已近萬般皆非是置入性行銷，被稱之為「移民」或「遺民」乃至「後遺民」。

在這塊土地上已承受無數次的震盪，歷經割據日本、國共內戰後的反攻基地、島內政黨輪替到兩岸關係逆轉；如此攸關人類遷徙、道德、權益與國界的議題，臺灣在如此複雜歷史變動下，移居者，在不同的歷史脈絡與政治企圖下有了不同的稱謂；然在不同的詞語，帶來了不同的語意，刻意地塑造了人民不同的想像。³⁰

在「難民其定位乃隨國際社會的發展與變動，產生不同的意涵與問題。」³¹的解讀，與其換句話說難民之所以產生，主因在於人的生存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前者為國家領土變更、政權更迭、種族衝突、宗教迫害及大規模之戰爭等；後者則是天然災害或自然生態破壞所導致人們離鄉背井、流離失所的情況。」³²

國共內戰，最後的成敗決定了海峽兩岸分裂的命運，此時的國軍已難有再戰之力，當下必須選擇退路與生存的空間，蔣介石當機立斷選擇了一海之隔的臺灣，作為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此一大戰略方針的決定，才有 1949 年的轉進移動，大批的軍眷便隨軍來臺。楊儒賓在《1949 禮讚》³³一書中將從大陸來臺灣的知識分子的移動稱之為「逃難」，當然也包括了外省的第一代。

有關「遺民」一詞，則有意識地不見容於新朝，在故國之思的情懷中堅持回歸的想望；自古有「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³⁴、「二老」³⁵，時采

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疋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其二老乃荅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³⁶；中華民國在臺灣，在國際的意義上是代表著國家仍然存在，雖然政權更迭，但所移居的土地仍是國境之內；臺灣由於處在國族認同分裂的歷史交叉點，遺民的悲情透過媒體傳播或文字印刷被大量複製渲染甚至消費，在方興未艾的本土論述眼中，遺民意識不啻保守懷舊的糟粕，卻是臺灣主體建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上述所指之遺民係乃國家興滅後，仍生活在原土地上之百姓，其與難民之性質不盡相同；且兩岸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他的意義恰巧在於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搖搖欲墜的邊緣上。在眷村第二代的身上，在初領身分證上的註記，仍然保留隨著父執輩而來的「大中國」的觀念；雖然國際的認同與立足點的現實利益下有了轉變，與父執輩有所差異，對生於斯又長於斯未來更會終於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焦慮與慾望有著更多值得探尋之處。

而移民的目的地，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在基礎上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來，亦所謂擇良木而棲，更為加速實踐夢想移地而居，經濟學上有提到的是「交換」的概念，而盧倩儀在〈政治學與移民理論〉是闡述了這樣的說法：

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移民理論是與推拉效應概念最為相近的移民理論。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看移民問題，移民現象與流量可以用不同地區不同的勞動供給與需求來解釋。³⁷

經濟學講求的是供需問題的市場經濟，在生產力與勞動力不足及地廣人稀的國家，有鑑於國家整體經濟開發的需求，勢必需要引進大批的移工來參與國家建設，如當年1.4萬華工飄洋過海赴美修築全長3000多公里跨州太平洋鐵路，於1869年完成美國史上第一條貫通東西岸的鐵路，今日在美的華裔多為其後代子孫。清華大學的李教授在〈影響我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中，已有透徹的分析，如下：

推拉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人口之所以遷移、移民之所以搬遷，是因為人們通過搬遷可以改善生活條件。于是，在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流動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為流動人口的推力。人口遷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³⁸

所以被稱做「移民」，這樣的定位則與1949年因戰亂，但被迫遷徙來臺的眷村人是不能被劃做等號的；就經濟學來解釋移民，其實就是一種交換行為，在不同的國境裏其身分是被襯托出來的，可由起源於十九世紀末之邊際革命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使用價值能解釋交換價值」。³⁹

不論移民、還是遺民，都意味著身心被無情的剝離及錯置。不同的族群與來自的居民，既然生活在這塊土地，被認同方式應首要確認的是在這個國家憲法下所保障與保護的國民，歷史的轉折畢竟已過往如煙，勿忘初衷、飲水思源才是這塊土地得以永續經營的唯一方式。事實已矗立在當前，回憶過往已逝，之後在這塊土地的耕耘才是共同的課題，從鑒往知來的態度來開創新局的理念，在張汝芳的《緣起緣滅—臺灣眷村文學「聚散」主題之探析》就有所呼籲：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是離散故事的大集合，對經歷過顛沛流離、離鄉背井的省外族群來說，即便受過無數次分離的苦，但在這些離散的背後，他們永遠保有一顆不想再受離散之苦的心；時代造成的動盪和悲劇，任何人都不樂見，只是省外族群不但得親眼見證這些生離死別的發生，自己更往往扮演主角的角色，他們的共同代號——「外省人」，說明了他們離開原鄉、告別親人、異地重生的生命歷程，也是「離散」最不爭的印證。⁴⁰

然而，歲月不居，反攻號角始終未被吹起，政軍局勢已悄然丕變。老一輩的將士們

早已是盔甲早卸、壯志銷磨，新一代眷村兒女則長大成人，走向現代化的都會。自小被哺育以父執輩的戰爭記憶與鄉愁想像的他（她）們，在封閉無私的眷村生活中凝塑共同的家國情感；而時移勢易，當反共不再，復國不再之時，卻是目睹村中故舊一再地死生聚散、曾依憑成長的眷舍又先後拆遷改建；當竹籬外臺灣優先、本土認同凌駕了大中國的虛幻精神召喚時，那麼他們的定位呢？

對於落腳於眷村的群體來說，身份認同的問題，是形成的焦慮與慾望的關鍵；一面是從小耳濡目染，關於大陸的想像，飄渺的「鄉愁」，一面是從小長大的土地；彷彿時空發生了錯置，他們被兩種不同的情感互相拉扯。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屬於哪一個族群。但是他們的父執輩卻曾經切實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在大陸擁有親人，大陸是實實在在的故土，對於眷村第二代來說，大陸是想像且虛幻的存在，而對眷村之外的臺灣，又有一點像他鄉的感覺；在這種情形下，眷村一這個實際可感的村落，是他們維繫自己身份認同的一個連結點。

原本居住在眷村的居民，許多都有搬家的經驗，可能是從一個眷村搬到另一個眷村，也可能是從此搬離眷村的世界，但是不管他們怎麼搬，只要眷村還在，隨時都有回去走走看看的機會，所以這樣的搬家並不是永遠的離開，朱天心在以下的字裏行間也不禁的抒發出自己的鄉愁：

離開眷村又想念眷村的女孩們，我深深的同情妳們在人群中乍聞一聲外省腔的「他媽的（音踏、馬的）」時所頓生的鄉愁，也不會有人嘲笑甚至想登尋人啟事尋幼年的夥伴或甚至組個眷村黨，因為妳不甘願承認只擁有那些老在社會版上、僅憑點滴資料但照眼就能認出的兄弟們。⁴¹

眷村的拆遷幾乎成了時代潮流，而且勢在必行，可惜的是隨著改建的落幕，昔日家園成為斷垣殘壁，往日為家人遮蔽風雨的一磚一瓦成了一堆堆的廢棄土石，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棟棟的高樓大廈，要重回記憶中的眷村幾乎不可能，這才是眷村人和眷村永

遠的告別。村子的拆除是大事，以眷村人事物為故事主角的眷村小說當然不會遺漏這樣的情節，雖然提及此事的小說文本不多，但仍可約略看出居民們對於眷村即將拆遷的態度。正如齊邦媛所說，「面對即將拆遷的眷村和村口被砍的大樹時，錯綜複雜的童年記憶令他們惆悵彷徨。這是軍人族群的第二度辭鄉」⁴²。在眷改的夢魘下，成為眷村兩代人共同經歷的離散經驗。尤其對於他們來說，父執輩的故鄉已經是望塵莫及了，生於斯長於斯的眷村才是他們真正的故鄉。但是這個故鄉喪失的時候，他們維繫自己身份認同的地方也即將消失。

終究，在社會的變遷與都市化的演進下，眷村第三代因父母的關係，或許大都不是在眷村度過童年，在記憶中爺爺、奶奶及外公、外婆的家，也僅僅是農曆年與其他節慶在眷村生活體驗的片段日子，他（她）們的身份認同則以朱天心「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⁴³的這句話，來印證他（她）們雖然是外省第三代，但也的確是真正生長在台灣更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因為這些人是有墳可上的，所以身份上也就沒有所謂認同問題。藉助傳承與眷村文化保留與再造，至少尋根對他（她）們而言是不成問題的，對眷村第三代而言，眷村的一切是他們的唯一線索，而包袱的卸下並非指現實的逃避。

國族是統一的概念，也是民族融合真正意義，族群的分裂只會讓國家衰敗，更會走向滅亡之途，歷史早已有所驗證，所以國家的存在代表國族的一致性，然國族能賴以生存則立足於國家的存在。

伍、眷村文化的再現／尋根的線索來自文化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於民國 1980 年與 1996 年分為 2 階段，一般以舊制與新制區分。民國 1980 年依據「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辦理眷村改建，民國 1996 年 1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開啟眷改新制時代；以「不建餘屋，建大村，遷小村；先建後拆，全面改建」為原則，且具有強制力；當時眷村

子弟們正開始成家立業，或因軍旅生涯及求學與工作關係紛紛離開眷村；眷村改建的政策雷厲風行如同排山倒海般勢不可擋，同時間臺灣社會經濟持續發展，都市日漸擴張、人口聚居，社會亦出現有效運用眷村土地進行都市更新之呼聲，使得他們的共同記憶的成長環境，無情地灰飛煙滅；眷村人亦步亦趨隨著政策的推行被邊緣化了，此時，他們的焦慮再一次無法壓抑。隨著政府快速更替的腳步，使得眷戶心生惶恐與怨懟。反「眷村改建」的聲浪，和民間團體呼籲政府須為「眷村文化保留」做努力；各地眷村興起的抵抗行動，終匯聚於 2007 年促成立法院三讀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文化保存修法，將文化保存精神納入眷村改建政策、地方政府取得眷村文化園區土地、改建基金可用於眷村文化保存用途等法令條文修正；然對於眷村人在面臨眷村即將消逝的更新變革，其實也是眷村人難以面對的抉擇。李鴻瓊就在〈共在虛實間：論朱天心《古都》中的記憶與共群〉提及：

現代都市的發展對延續與穩定文化空間的破壞是朱天心小說一個重要的主題。……眷村空間遭到破壞、遺棄，最後荒廢而消失，外省族群因此散離到城市各處，而其共同生活經驗與記憶也逐漸被遺忘。……不同族群共同生活記憶的物質載體因此遭到破壞，族群之間則因為政治權力的更替與傾軋難以維持和諧的關係。然而，解嚴除了帶來政治變化（包括本土化）之外，也必然帶來過去歷史的解嚴以及偽共同性的破產，隨之而來的則是過去穩定與和諧關係的變動甚至是消解。⁴⁴

兒時記憶與成長的回憶，隨著眷改政策而逐漸淡忘，但外省人這個別稱，卻三不五時迴盪在耳邊；當然，若是不被扣上族群分裂的帽子，相信這些人也會樂於接受；畢竟，身上的基因是遠從大陸來自各省因逃難而定居在此的父母，是無庸置疑的。眷村文化的呈現只能靠眷村第二代的全體，然經歷這一切的眷村第二代正面臨即將老去的現實，他們一路走來經歷政治、文化與族群的時空交錯下，或多或少保留了父輩當初胼手胝

足經營與締造出的文物與傳統；對於第二代成長的眷村外省子弟而言，生於斯長於斯的眷村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歸屬，既使竹籬笆之外是饒舌之語，生活習慣迥然不相同的異文化，也只能把他鄉作故鄉，而是生活其中的群體形態、情感記憶、文化特色。眷村的共同生活經驗與記憶，無疑是自己認同了他們精神與實質的家園。「眷村不僅是空間，也是記憶的形式，更是生命的氣質。」⁴⁵而黃錦樹更在〈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從朱天心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重申了眷村第二代對家鄉的情懷：

如果把「眷村」視為一個隱喻，（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至少同時招喚了白先勇，張大春等人；那麼『台北人』、『將軍碑』、『四喜憂國』也可以視為同類型的著作。就這些著作中的敘述者而言，他們（如：老兵、將軍等）敘事觀點中的台灣，做為「復興基地」，又何嘗不是一個大眷村？當統治者意識型態籠罩的地域逐漸減少之際，那些「無法收復的失地」，也就是「台灣」漸漸「收復」的「失地」。在眷村退卻之際，台灣的主體性卻逐漸彰顯。因此，在朱天心的「街談巷語」中，是否也體現了「做為隱喻的眷村」的歷史的消失？這 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⁴⁶

眷村文化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文化，恰似諾亞方舟漂流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是這些潰敗的殘餘部隊軍人被迫帶著眷屬離鄉背井，搭上了蔣介石所打造的諾亞方舟，逃離了中國共產黨的紅潮所創造出來的。來自不同省籍與文化的人就在這歷史的悲劇下，很自然地相知相扶持，在各省生活習慣、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下，逐漸包容與適應而形成典型的眷村文化。文化，是被當時的群聚與時空所襯托出來的，其本質在於比較其相對性與絕對性；文化的傳承與保留並光大之的作為，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觀念上要有所體認。隨著眷村改建政策，老舊眷村的房舍一間間在無助下已成為瓦礫碎片，眷村人為保留根之所在，更自發性推動眷村文化保留作為；除委託當地民意代表向地方政府積極納言，更以原村里辦公室成立以推動眷村文化保留為訴求工作室，積極以座談

或陳展方式來凸顯眷村文化的時代意義與價值。黃錦樹在〈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一從朱天心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中，對於文化的保存方向已有建設性的建議，如下：

從眷村保存現場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政府治理的同時，民間對於眷村文化的關注發展出各種結合以眷村文化、歷史與認同的眷村文化活動、美食節展銷活動與眷村文化館的文化創意產品。而眷村影視製作，如「寶島一村」舞臺劇與「光陰的故事」票房收視長紅，眷村凝結的時空環境成為影視拍攝的場域，甚而是成為發展陸客觀光之名的地方經濟發展推動想像。由於眷村文化主體的特殊性，我們在 13 個眷村文化保存區的案例當中，可以看到眷村、社區、民間與政府之間對於「文化治理」眷村保存政策意義的競逐，反映出對於文化政策擬定、文化發言權主導、文化經濟分配、文化產業發展、文化政治合縱與文化抵抗權力等等。從上述「網絡治理」或「治理網絡」對於「文化治理」的思考，本研究將從民間眷村文化能動者的多元角色在實際地方的努力與成果，進一步展開對於政府在當前眷村文化保存政策的探究與反省，更進一步思考眷村文化治理的分權、參與、合夥、協力、合作互惠的機制可能性。⁴⁷

文化的保存：包括文學、詩詞、字畫、語言、美食等。飲食，更為文化的起源；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以飲食習慣牽引出大江南北對吃的意境，因為有了眷村生活的記憶，中國大陸南北口味在臺灣得以流傳並發揚光大之；滿足老饕的口慾且無須親赴發源地，這一切應歸功於眷村文學的記載，若如是之則眷村文學可視為生活化的文學；眷村老樹是皆為眷舍最自然的遮蔽物，是有故事性的。大人們樹下乘涼聊天、孩子們樹下玩耍嬉戲，承載著多數眷村人的生命記憶，深具保留之意義。

張曉風女士曾說「當你老的時候，這棵樹正在年輕」，如此這般的心境；面對文化再現的重要課題，再以她的另一句話「父親到底記得什麼，不記得時什麼」來做為個

人的省思，也切確的說明文化是尋根的方向，而文化的保留更是刻不容緩的事實。

陸、結語

第一代眷村人或是已經漸漸老去或是已經被深埋在異鄉的土地，他們對大陸生活的記憶也隨著他們的年齡的增長變得更為親切而遙遠，但是對於眷村第二代的人來說，他們對大陸家鄉的記憶是來自長輩的口耳相傳，而因升學、出國、結婚、工作他們離開了自己童年生活的眷村，使得眷村這個共同體的記憶遭受到遺忘的危機；於是第二代的眷村作家紛紛用自己的筆記錄下過往的記憶，用書寫的方式來力挽其被遺忘的危機，朱天心與黃錦樹深知隨著眷改的落幕，眷村第二代被迫嚐再次到父執輩離散的滋味，更分別憂心提出如下他們的感概：

在急速都市化，在「反攻復國」的意識型態破產之後，「眷村」做為一種特殊的人文生態環境已經漸漸的消失。「眷村」的邊界逐漸溶蝕，「眷村的兄弟們」散佈於都市的各個角落。在現實裏的「眷村」消失後，他們化身為隱形的族類，他們的下一代業已不再是「眷村子弟」，而是島嶼的居民。所以她（對自己）說：「總而言之，你們這個族群正日益稀少中，妳必須承認，並做調適。」⁴⁸

族群人口的日益減少，就暗示了記憶傳承的中斷危機，暗示了這一段歷史被「擦拭」以至消失的可能。所以，她不斷的回憶、召喚，一又一家人的「巡視」那些同為小說家的昔日眷村子弟，彷彿在呼喚說：「起來吧，你們這些和我相同的族類，我們一起寫歷史……」⁴⁹

對成長於眷村的第二代與外省子弟而言，長輩的故鄉縹緲不可期，生於斯、長於斯、喜怒哀樂於斯的眷村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歸屬，即使是竹籬笆之外的饒舌之語，生活習慣迥然不相同的異文化，也只能把他鄉作故鄉，眷村的共同生活經驗與記憶，無疑

是眷村自己認同了他們精神與實質的家園；《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中的題材，在以國家正統為主體的史學家眼中，也是「必要遺忘」的部分；雖然如此，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事實，更不能抹滅正統與血統的出身，眷村裏的父執輩因戰亂而移居到這個被稱作福爾摩沙的海島，但此地中華民國的憲法上，其國土的認定是不爭的事實，當時的逃難而造就今日民族的融合，這是時代潮流的趨勢，在當時也是意想不到結果，如著名的小說家張愛玲常引用月亮來引申人、事、時、地、物的變遷，過去的省籍情結與政治鬥爭不能再無止境的擴張；如果國族是想像的共同體，而家族地位重要的不是語言、土地，而是生活其中的群體如何補足其意識形態、情感記憶、文化特色。換言之，這些題材最適宜的存在方式恐怕一種半虛構形式，最具體的例子是〈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外省族群對臺灣的認同常常是眾所矚目的焦點，「眷村」的意義對第二代而言，似乎不只是小時候成長、居住的地方，甚至已被內化成等同於「故鄉」意義的名詞，因此在眷村文學小說書寫中可以讀到作家在搬離眷村後的回歸，甚至以一種近似辭鄉的心態看待眷村的拆除，有形的眷村雖已消失，但無形的對眷村的緬懷，或許已深深烙印在許多生於斯、長於斯的眷村人心中。「竹籬笆」的生成與眷村第二代的生命經驗緊密相關，竹籬笆也成為眷村第二代的鄉愁象徵。然而相對的，「竹籬笆」對於村外人而言，成為眷村人隔絕於臺灣本地人生活環境的疆界，國家對於眷村治理制度的連結，形成一種眷村獨有的「特權」與「區隔」，眷村作為臺灣特殊歷史社會情境下生產的獨特住居型態，是時代的見證；正因為如此，眷村文化的再現是需要中央政府全力輔導地方所要做的努力，文化與精神是唇齒相依，也是傳承的重要環節，透過眷村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重新建構歷史的足跡，讓眷村文化再度風華再現。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是「眷村文學」不可不談的傑作。不過，作家張大春在該書「序文」中指出，《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更重要的，是貫穿整本小說的「老靈魂」：「老靈魂是試圖凍結或滯止時間的渴望，也是透過虛構重塑歷史或記憶的載體。」，題名

既然是「想念」，代表自己和「眷村的兄弟」的關係已成為過去式，這個觀點在李鴻瓊的〈共在虛實間：論朱天心《古都》中的記憶與共群〉文中，又再度被強調：

這是回憶主體所遭受的抗拒，是自我的抗拒也是代現結構或社會歷史結構本身的抗拒，所以是道德的抗拒，因為道德除了直指共群社會形成的規範之外（所謂政治正確的道德），也牽涉回憶的倫理責任：回憶或實在化那些「非部分的部分」。修改過的記憶固然是為了維持自身世界的完整，但記憶總是修改過的，不經變動的記憶只是單一重複而已。²⁰

小說敘述者是眷村出身的女性，一如張大春指出「老靈魂」，幽幽站在即將消逝的眷村世界，帶領讀者穿梭時空，緩緩的道出從小與眷村兄弟朝夕相處，從渴望成為他們的一員，到長大後逐漸產生隔膜而分道揚鑣的過程。在小說的開始，朱天心以感性的要求請讀者先放一曲〈Stand by me〉，再慢慢細讀她的作品並在這首歌的播放下，一起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她成長的家鄉。

我們在這首歌音樂的環繞下走進了朱天心的小說世界裏，眼前出現一位正值青春期的她，一直盤桓在眷村的哥兒們身旁久久不去。朱天心以女性青春期初經來潮的她，作為和眷村兄弟緊密關係的分界點，少女身體上的轉變，除了點出女孩轉變為女人的成長模糊地帶，也暗喻自己對眷村認同開始產生不確定感。小說裏也揭露了女性在眷村內的複雜經歷，尤其是提到小玲的遭遇，單身老兵對女孩諱莫如深的性啟蒙之猥褻行為，而這是其他眷村小說極少處理的。

透過外省、本省的婚姻結合，她疑惑著本省人年年掃墓的習俗，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未曾掃墓，帶出非常重要的感慨：「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⁵¹這篇眷村小說直視身分認同的複雜性，揭示眷村人在臺灣生活的種種艱難除了同情，朱天心更透露批判意識，外省人等於國民黨或者權貴階級的刻板印象，讓寫小說的她因不苟同而憤怒。因此，朱天心不厭其煩梳理眷村生活的細節，說明眷村人必須被視作有差異性的「個體」，而非僅是「群體」來對待。外省人身份認同問題直到小說的最後，朱

天心以對話方式在暴露她批判現實與懷舊之間猶豫。或許，這種不確定性與多元性，就是外省第二代身份認同的本質吧！

參考資料

一、古籍影本

- ↑ （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卷四》，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 ↑ （宋）章樵：《古文苑卷五》，北京：中國書店，2012 年 2 月。
- ↑ 《聖經·創世紀》，臺北：臺灣聖經公會，2009 年 9 月。

二、專書

- ↑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
- ↑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所主編：《回顧兩岸五十年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4 年。
- ↑ 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 ↑ 夷青：《我從眷村來》，臺北：希代出版社 1986 年 2 月。
- ↑ 苦苓：《外省故鄉》，臺北：希代出版社，1993 年 9 月。
- ↑ 孫璋芒：《卡門在臺灣》，臺北：九歌出版社，1995 年 3 月。
- ↑ 袁瓊瓊：《今生緣》，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 年 2 月。
- ↑ 張大春：《四喜憂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 年 5 月。
- ↑ 張啟疆：《消失的口口》，臺北：九歌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 ↑ 張國立：《小五的時代》，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 年 6 月。
- ↑ 陳義芝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385-409。又見李瑞騰編，頁 1023-1050。
- ↑ 愛亞：《曾經》，臺北：爾雅出版社，1985 年 11 月。
- ↑ 楊佳嫻 《方舟上的日子—臺灣眷村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年 10 月
- ↑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 ↑ 蕭颯：《如夢令》，臺北：九歌出版社，1981 年 7 月。
- ↑ 蘇偉貞：《有緣千里》，臺北：洪範書局有限公司，1984 年 11 月。
- ↑ 蘇偉貞：《離開同方》，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 6 月。
- ↑ 陳義芝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385-409。又見李瑞騰編，頁 1023-1050。

三、期刊

- ↑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37。

- ↑ 李強：〈影響我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中國社會科 第 1-6 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25－136。
- ↑ 李鴻瓊：〈共在虛實間：論朱天心《古都》中的記憶與共群〉，《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第 4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1－36。
- ↑ 張嘉仁：〈新古典經濟學觀點下之國家財政赤字〉，《政策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7 月，頁 47－82。
- ↑ 梁崇民：〈歐盟對於少數人權之保障—少數民族、少數語言個案分析〉，《歐美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 2004 年 3 月，頁 51－93。
- ↑ 黃錦樹：〈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從朱天心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海峽評論》第 18 期，1992 年 6 月，頁 66－68。
- ↑ 廖福特 〈區域人權體系研究之必要及缺乏〉，《新世紀智庫論壇》，2006 年第 34 期，頁 36－40。
- ↑ 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9 年 7 月，頁 179－203。
- ↑ 盧倩儀：〈政治學與移民理論〉，《臺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209－261。
- ↑ 龔允倩：〈冷戰下的移民與難民—以臺灣為例〉，《文化研究》第 17 期，2013 年秋季，頁 225－231。

四、學位論文

- ↑ 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臺北：文學再現與臺北東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7 月。
- ↑ 張汝芳：《緣起緣滅—臺灣眷村文學「聚散」主題之探析》，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
- ↑ 陳培文：《朱天心的生命風景與時代課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 ↑ 董俊仁：《跨越竹籬笆－臺灣眷村文化保存實踐與政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1 月。

五、網路資料

- ↑ 參見〈眷村文學〉網址：〈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1/C0112800150/literature/literature_5.htm〉，檢索時間：2018 年 11 月 3 日。

海軍軍官讀者意見調查

A. 本刊物哪些文章或題材合乎您的興趣且內容令您滿意？

B. 您希望本刊後續選擇以哪些題材為主題？

C. 您覺得本刊全新改版之之整體編輯設計、編排方式是否令您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意見：

D. 本刊吸引您閱讀的原因是（可複選）

☐可增進新知

☐可供資料蒐整

☐與本身職務相關

☐文章內容引人入勝

其他原因：

基本資料（本欄僅為統計之參考，請放心填寫）

姓名

職業

職務

電話

海軍軍官季刊 第38卷第3期 中華民國108年8月 Quarterly No.3, Vol. 38 2019.8

徵稿簡則

- 本刊為海軍綜合性刊物，提供本校教官（師）、學生及本軍學術研究寫作園地，藉以促進研究風氣，培養術德兼備及具發展潛力之海軍軍官，達成本校教育使命，其宗旨如下：
 - （一）研究自然科學、管理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科學新知，啟發人文哲學思想與建軍理念。
 - （二）研究海軍科學、作戰、戰術與戰具等海軍知識，提升國防科技，切合海軍「建軍備戰」、「教育訓練」之目標。
 - （三）報導海軍學校教育政策、活動、典型人物介紹及生活資訊報導等。
 - （四）砥礪學生品德與忠貞節操，培養並推廣本軍寫作與研究之風氣。
- 來稿以創作為主，且優先選登，或譯作以不超過每期篇幅50%為限，來稿內容應慎防涉及軍事機密，並格遵保密規定；請勿一稿兩投或抄襲。
- 來稿以五千字至八千字為度，如原文過長，得由本社考量分期刊出。
- 來稿請以稿紙橫寫或A4紙張直式橫書印製，字跡務請繕寫清楚或附電子檔案，如附圖片請以清晰為要，電子圖檔解析度300dpi 以上以利印刷，稿末請加註姓名、身分證號、學歷、經歷、現職、聯絡電話及地址；譯作請另附原文影本。
- 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投稿一律不退還，稿酬從優，每千字680元至1020元，圖片一幀270元，以不超過每期預算為原則，一經採用，未經本社同意，不得翻印、抄襲或挪作其他運用（請自行至本校全球資訊網／行政單位／教務處／著作權授權書，下載「海軍軍官季刊著作授權書」後，併同稿件寄達本校。）
- 來稿請寄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海軍軍官季刊」收，或逕送本社。
- 凡學術型稿件請依以下“註釋體例”纂稿：
 - （一）所有引註均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其他論文、著作，須另行註明，不得逕自錄引。
 - （二）專著須依次列出作者、（譯者）、書名、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格式如下：
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專書：Author’s full name，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Place of publication：Publisher，Year），P.X or PP.X-X
 - （三）論文、雜誌、期刊等須依次列出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期刊出版地、出版者可省略）格式如下：
中、日文論文：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論文：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redactor，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Place of publication：Publisher，Year），P.X or. PP.X-X。
 - （四）第一次引註須注明完整之資料來源，第二次以後得採一般學術論文之省略方式，為全文使用方式應相同。